

外国语言学名著译丛

语言地理类型学

[日] 桥本万太郎 著

余志鸿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外国语言学名著译丛

语言地理类型学

[日]桥本万太郎 著
余志鸿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地理类型学/[日]桥本万太郎著;余志鸿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8. 6

ISBN 978-7-5062-8766-1

I. 语… II. ①桥…②余… III. 地理语言学—研究 IV. H0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9960 号

语言地理类型学

著 者:[日]桥本万太郎

译 者:余志鸿

责任编辑:潘 虎

封面设计:星银河(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http://www.wpcbj.com.cn>

地 址:北京市朝内大街137号(邮编100010,电话010-64077922)

销 售:各地新华书店及外文书店

印 刷: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1mm×1245mm 1/24

印 张:9.5

字 数:189千

版 次: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62-8766-1/H·1038

定 价:2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外国语言学名著译丛

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陆俭明 沈家煊 胡壮麟 桂诗春 鲁国尧
蒋绍愚

副主任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丹青 何自然 吴福祥 姚小平 曹广顺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言仁	文秋芳	方 梅	王立非	王初明
王建勤	王洪君	王 寅	冉永平	冯志伟
宁春岩	石 锋	刘振前	朱庆之	任绍曾
江 荻	吴海波	岑运强	李小凡	李向农
李战子	李柏令	陆丙甫	陆汝占	沈 阳
汪国胜	杨永林	杨亦鸣	杨信彰	张伯江
张德祿	张 博	胡建华	姜望琪	祝畹瑾
高一虹	高立群	顾曰国	郭 锐	钱 军
袁毓林	崔 刚	崔希亮	黄国文	程 工
程晓堂	董秀芳	彭宣维	曾晓渝	熊学亮
潘文国				

总 策 划 郭 力

《语言地理类型学》导读

余志鸿

历史比较语言学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在 19 世纪的欧洲曾控制了整个语言学领域。英国杰出的东方学家威廉·琼斯偶然地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印度古典语言——梵语，跟拉丁语、古希腊语和法语似乎存在着如同个人与家族之间的那种亲属关系。事后，西方学者证实了其中不容置疑的历史联系，从而成功地建立了语言谱系学说 (Family tree)。一个成功的理论引导出一批优秀的学者。这一时期涌现了不少语言学的巨匠，如丹麦的拉斯克 (R. Rask)、法国的葆朴 (F. Bopp)、施莱赫尔 (A. Schleicher)、格林 (J. Grimm) 和梅耶 (A. Meillet) 等，他们发现了“语音对应规律”，并构拟出“一般历史性的公分母”——印欧语的原始形式。他们一直在挖掘已经消失的印欧语系大厦的地基，并试图在这已成废墟的地基上重建印欧语系的语言大厦。他们的成功，使语言学开始进入科学的领域，并为现代语言学开辟了道路。但是，他们的成功，也造成了语言科学中的“迷信”，以致较长时期许多人都相信历史比较法是研究语言之间关系的唯一方法！于是，科学的理论走向了极端。伟大的牛顿尚且怀疑过自己的定律，当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达到无穷大的时候，引力还存在吗？然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崇拜者深信不疑，他们把历史比较法视为语言比较研究中的万能钥匙。可是，这种方法一旦运用到亚洲大陆，特别是对汉语的研究，就顿时陷入了困境。

当一个理论越出了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一旦与事实背离，它就会像虫蛀的柱子，再也无法承受功绩和荣誉垒成的建筑物。这时候，或者重建新的柱子，探索新的理论，或者修修

补补，用拼凑堆砌的事实来维持摇摇欲坠的局势。不少人在做后一种工作，他们竭力在亚洲各语言之间寻找“亲属”关系。有的从语法上比较，认为汉语与台语是“亲属”；有的从词汇上比较，认定汉语与藏缅语是“亲属”；有的则认为台语与汉语在发生学上没有亲属关系，如雅洪托夫主张台语与印度尼西亚语、孟高棉语构成了“南方语系”，而班尼迪克特（白保罗）干脆提出建立“东南亚的一个新的联盟”；而有的则采取否定主义，说汉藏语系并不存在，它们实际上是两种更原始的语系——太平洋语系和南亚语系的某种混合物！这样的研究并非毫无意义，但带来了思想混乱，且无助于科学理论的发展。尽管如此，人们终于发现了新问题，一些本来似乎已成定论的“亲属”语言，例如仡佬语、嘉戎语、羌语、景颇语、载瓦语等，现在却又需要重加审核了；一些全然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却发现了十分相似的地方，例如印欧语同源词中一向被认为稳定因素的数词，在东亚的越语、朝语、日语、泰语里，由于互相借用和同化变得与汉语惊人地相似！

面对这一现实，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教授大胆提出了新的理论——语言地理类型学。这一理论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阐述。正如朱德熙先生为这一著作的中译本所写序言中说的，“桥本先生的书冲出了这种思潮的藩篱，高瞻远瞩，一空依傍。因为站得高、站得远，所以能摆脱种种障碍和约束，看到在低处、近处看不到的东西。”

桥本万太郎 1932 年生于日本群馬县，1953 年东京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他专修汉语，曾从仓石武四郎先生学习《说文解字》。早在中学时代，桥本从父亲书架上翻阅泉井久之助的《语言的结构》一书，便对语言和语言学发生了兴趣。当他还是大学生时，就显示出语言才能；他调查海南语，成功地发出难度较高的内吸音 [ʙ] [ɖ]，并描写了发音机制，受到语言学大家服部四郎的赞赏。1957 年桥本获得东京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1962 年修完博士课程，留学美国，学习“生成语法”，并成为乔姆斯基早期学生和盟友罗伯特·B. 李兹博士的共同研究员。1965

年，他以优秀的成绩获俄亥俄州立大学第一号语言学博士（桥本夫人余霭芹是第二号博士）。当时曾被报界誉为“第一号日本人”，称道“*This soft-spoken oriental scholar*”（说话温柔的东方学者）。嗣后，桥本在大洋两岸工作。他生在东方文化圈的日本，又接受了具有丰富积累的西方文化，使他有可能比较客观的考察东西方传统语言学理论。他觉得以往在欧洲取得成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未必适用于东亚大陆的语言实际，于是他以敏锐的目光，渊博的学识，辛勤的田野作业，悉心研究东亚大陆的语言现象。

1981年暑，桥本在北京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作了题为“语言发展的两种学说”的学术报告。他说任何自然语言没有一成不变的，都是历史变化积聚的结果，从本质上认识，人类语言是很保守的，因为它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没有某种原因，是不肯轻易改变的。比如“洗澡”，在日本是指洗热水（湯に入る），尽管在日本的热带不洗热水。显然有些词，即使社会条件变了、自然环境变了，但它们还是可以用。基本词更是如此。谱系树说正是立足在这一基本观点上。例如动词“站”在印欧语分布：

梵语	伊朗语	古希腊语	拉丁语
sthā	sta	histawai	stāre
古斯拉夫语	哥特语	凯尔特语	
stajati	standan	clwaisia	

原始祖语则为 *stā。但是，只要看一下东亚语言，尤其是汉语：

北京	苏州	温州	厦门	广州
站	立	该	倚	企

既然是基本词，如此不同怎么能有共同祖语呢？我们不能不对谱系树说怀疑了。再比如“海”、“铁”这类词，在印欧语里非常不同，十分杂乱，而在汉语里却恰恰相反，不管在哪个方言都很近似。这是什么道理呢？桥本认为，这是因为东亚大陆民族发展与欧洲不一样，东亚的周围民族缓慢地被中国同化着；从自然环境看，东亚大陆中心是富饶的平原，人民世代定居，欧洲不同，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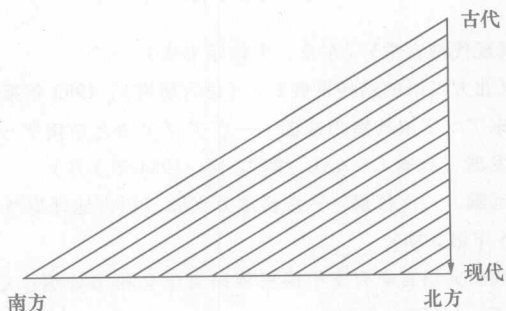
加索土地干燥而多盐碱，原始人不是牧畜就是行商，不断迁居成了他们的习性。据此桥本用形象的比喻称东亚大陆的语言为农耕民型语言，称印欧语言为牧畜民型语言。

我们生活在汉语的环境里，自然而然地会认为它自古以来就是这么个样子——我们已经习惯了用“汉字”来衡量汉语，或者确切的说，通过汉文古籍来研究汉语的历史变化。而现代汉语南北方言里的词语，大部分都可以在汉文古籍里找到相应的汉字，因此，很容易把现代汉语看作是古代汉语一脉相承地直接演变过来的。于是，在“心理”上不愿意接受对“汉语”自身存在及其原形的任何疑问。但是，一个理论的认识价值与它对人们的心智的心理影响毫无关系。理论以它的客观实在性为基础，并且在外围有与它相关的全部知识为背景。当然我们不可忽视人们的心智的心理影响，它会导致对一个新生理论的“反驳”。1925年古典以太理论的热心拥护者米勒，就曾进行试验并对爱恩斯坦提出“反驳”，并声称“从根本上打垮了爱恩斯坦”。其实，米勒的试验成果与爱恩斯坦的理论并不矛盾，只是对成果的解释与相对论不同罢了。现在，桥本的理论也同样遇到了“反驳”。

有人反驳桥本关于汉语南方方言中存在着非汉语的成分的观点，例如闽语中说“杀”为 t'ai，说“脚”为 k'a，但《说文》、《方言》里不是有个“刳”或“治”字和“骹”字吗？“反驳”的事实不假，但“反驳”者为什么不反过来想一想，《说文》、《方言》里记载的汉字词，是不是都代表“汉语”呢？

有人不同意桥本关于“汉语”存在南方型、北方型的提法，例如闽语的“鞋拖”、“人客”、“历日”等，在北方方言中说成“拖鞋”、“客人”、“日历”，认为这不是结构类型的差别，而是“对同一事物认识的中心概念的差别”，因此两种语序都是修饰语加被修饰语。如果从维护现代汉语内部系统的一致性看，作这样的解释未尝不可，但放在语言的地理差异、历史演变以及与周围民族语言的比较中考察，就很成问题了。我们也可以来个反问，这类语序何以独多见于南方方言？又何以与台语的语序如此一致？

有人不赞成北方汉语的阿尔泰化提法，但承认汉语受阿尔泰语的重大影响。究竟是“化”还是“影响”，无法计量分析，但从整体类型上考察，北方汉语量词单一化、声调简化、多音节词强化，“把”字的通古斯语源和日益成熟化等等，与阿尔泰语何其相似。所以，桥本曾就语言的历史演变与地理变异的对应关系画了个如下三角形：现代汉语南方方言正是古代汉语的历史投影；随着地理推移，现代汉语北方方言显示古代汉语历史演变的结果。



由此我们可以进行如下反思：如果汉语没有北方阿尔泰语和南方台语的接触和影响，何以在地理上呈现如此微妙的对应？如果现代汉语由古代汉语直接演变而来，那么为什么南方方言与古代汉语有较多的对应？北方方言为什么发展得如此迅猛？

撇开一个理论的整体内容，孤立地提取个别事实作为证伪性例子，是不可靠的。桥本理论的基点就是东亚大陆语言的文化背景；它的目的就是要提出研究语言时将“纵”的（历史的）与“横”的（地理的）比较有机结合的方法，并且试图成功建立一个语言“连续体”（cline）。桥本在论证这个“连续体”理论时，已经非常大胆而惊人地预测到汉语的南北两大来源。一个新理论体现它的活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它的预测性。现代科学已证实了他的预言，在中国古老大陆上，曾经生活着两种不同发源、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原始人。上海输血研究所应用血清中的GM血型技术，首次揭示我国以北纬35度左右为分界线，中华民族分为南北两大发源地。至今我们还能从人种学角度发现南方人

和北方人体型、面容五官和身体素质方面的明显差异。总之，南北语言的类型差异，乃是人类发源的差异，那么一切对桥本理论的疑问也便冰释。至于桥本在“连续体”理论中关于一方向另一方推移的设想，则须要略加修正：东亚大陆南北两种原始语言不是一方向另一方的推移，而是双方在中原地区的会合和交融！但是，这种修正性思考，丝毫不影响桥本先生的伟大发现和他所创建的语言地理类型学的伟大学术价值。

参 考 文 献

桥本万太郎：《现代博言学》（东京，大修馆书店）

桥本万太郎：《北方汉语的结构发展》（《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

桥本万太郎：东アツア语构造の来源——东アツア语と东南アツア语の横の推移と纵の发展（日本 CA AAL，第22号，1984年3月）

胡双宝：高瞻远瞩，一空依傍——读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语文研究》，1986年第2期）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语言研究室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秘书处编：《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1980，北京）

余志鸿：汉语的文化历史背景（《语文导报》，1987年第7期）

序

德·索绪尔区分共时的和历时的语言研究方法的学说，给 20 世纪的语言研究带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积极的方面人所共知，用不着说。消极的方面，指的是由这种学说导致的把对语言的历史研究和断代描写截然分开，看成是毫不相干的东西的倾向。叶斯泊森的巨著 *A Modern English Grammar*，由于书名里有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而受到指责，认为描写“现代”英语而追溯“历史”是自相矛盾。汉语研究自然也受到了这种思潮的影响。就国外说，研究汉语的年轻一代的学者里，关心历史的比起上一代汉学家来要少得多。就我国国内来说，研究现代汉语的人往往只研究普通话，不但不关心历史，把方言研究也看成隔行。画地为牢，不愿越雷池一步。这不管对本人说，还是对学术发展来说，都不是好事。

桥本先生的书冲出了这种思潮的藩篱，高瞻远瞩，一空依傍。因为站得高、站得远，所以能摆脱种种障碍和约束，看到在低处、近处看不到的东西。读者可以不完全同意书中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但是这部书能够帮助我们扩大视野，开拓思路则是毫无疑问的事。

桥本先生素以方面广、著述多为同行称道。先生方当盛年，今后肯定还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我特别希望他能够直接用中文为中国读者写书、写论文，因为他的中文够好的，而中国语言学界懂日文的却实在太少，至少目前是如此。

是为序。

朱德熙

一九八五年初于北京大学

汉文版前言

笔者写这本小书的意图是，阐明现代语言学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语言为什么会变化。这个问题，似乎只关系到历史语言学。自从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倡导之后，严格区分语言的历时的和共时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近代语言学家的常识。但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以后，世界社会科学研究回到了健康的理性主义，语言学家发现了一个非常普通的道理：既然世界上的语言没有一个是新产生的，既然它们的结构和系统都有其历史背景，那么，各个语言共时态里所能见的各种规律性和非规律性，应当说都是历史变化的产物。如果共时语言学家的任务是发掘这些规律而完成对该语言最合理的结构描写的话，语言为什么会变化这个问题跟共时描写语言学直接有关，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换言之，语言为什么会变化这一问题，不仅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出发点，而且是它的落脚点。

为了了解语言为什么会变化，我们首先应当知道语言是怎样变化的。提出语言怎样变化这个问题，我们所要阐明的是这些变化的实际过程和机制，而不是语言结构系统变化结果的平面描写。一说到语言变化过程和机制，我们立刻会发觉，语言学家旧有的知识过分依赖印欧语发展资料了。印欧语自古以来分散到欧亚各地，很多语族各自独立地发展。但是，世界上的语言并不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尤其是东亚大陆语言的发展，基本上是由东方文化中心地的语言缓慢地同化周围语言的过程。因此，语言结构的历史变化和地域推移的对应相当整齐。笔者的意图是根据东方语言发展史的事实和资料，建立新的、更为普通的语言发展理论。

本书原版印刷的时候，笔者正在中亚进行野外调查，未能

读到校样。书一出来，就发现有很多错字，本拟马上修改，只是一直没有时间。而更为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可笑的是，笔者写这本书之前，没有访问过中国大陆，没有机会向中国大陆的朋友请教。作为一本讨论东方语言结构发展的书，这是一个最大的、最严重的欠缺。幸好，1981年秋，笔者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的邀请，首次访问了中国。次年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之后，根据日本学术振兴会和中国教育部之间的交换协议，在北京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半年。两次访问期间，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山西省语言学会、山西省方言研究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市语文学会、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中南民族学院、兰州大学、甘肃省语言学会、兰州市语言学会、青海师范学院、青海民族学院、青海省语言学会、南宁师范学院、桂林民族师范学校等单位作过学术报告，讨论东亚各语言结构类型的各种问题，并借机就本书所述语言事实及各种问题重加讨论，同时作了可能的补充和修正，以就教于各位新老朋友。根据这些学术经历和所受的启发，北京大学中文系又提供机会，使我得以修改这本书。笔者在这里对向景洁、朱德熙、叶蜚声、陆俭明诸先生以及系里其他朋友所给予的指导、关照、帮助和友谊，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汉文书的出版，有赖于几位朋友的友谊。上海中医学院余志鸿先生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念研究生的时候，为翻译本书，单是跑上海图书馆，每天就要花两个小时。笔者在美国时，复旦大学中文系把译稿油印出来，余先生寄到西雅图一本，要作者校读。他和他的老师胡竹安先生在《国外语言学》1981年第4期上介绍了本书的内容。北大中文系胡双宝先生两读余先生的译稿，不只对行文，而且对内容也提出了很多意见，做了全面的加工。此外，北大东语系徐昌华先生校读了序言及头一章，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朱德熙先生细心审阅了译稿，并愿为写序，向中国朋友介绍本书。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国际友谊和合作的结果，与其

说是译本，不如说是增订版。

友谊是可贵的，但更为可贵的是学术上严肃的切磋琢磨。因为没有互相的讨论和批评，就不会有学术上的进步。虽有这么多朋友的帮助和合作，但限于作者的水平，加以中国地大，人多，“语”博，书中错误之处一定不少，没有注意到的语言事实自然更多。所以，笔者恳请读者随时提出各种意见，烦请北京大学朱德熙先生转桥本万太郎，或径寄日本国〔114〕东京都北区西原4—51—21 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桥本万太郎，均无任欢迎。

作 者

1983年7月13日于东京

前 言

本书所论述的，是笔者1972年归居远东后，先后在朝鲜半岛（1972年）、香港（1973年）、尼泊尔（1975~1976年）、苏联中亚（1976~1977年）等亚洲大陆各地考察时涌现的设想，现在提供给从事语言学的行家探讨；为了便于一般读者阅读，尽量写得通俗些。

本人出生于远东，素有研究亚洲诸语言的兴趣。年轻时代在北美重新接受专业教育，后又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十年之后回来一看，亚洲的一切是那么新鲜，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发现。我痛感对亚洲的无知。从这以后，不管到亚洲哪个地方，不管作何种语言的调查，每当碰到新的现象，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脑际：这些现象如果在汉语或自己的母语日语里又该怎样？作为一个亚洲的语言学者，这种想法应该是很自然的。下列文章和演讲便是我的那些不成熟的想法（以发表前后为序）：

(1) 〈汉语南北方言的“体（态）”性质〉——1974年9月2日，于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一般研究计划会议上宣读。

(2) 〈亚洲诸语言的地理类型〉——1975年1月27日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语言学研讨会上演讲。

(3) 〈汉语的历史和类型〉——1975年4月26日于（日本）中国语学会关东支部例会（东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上宣读。

(4) 〈亚洲大陆语言的接触〉——1975年4月30日于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所内研究会上宣读（内容提要见《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通信》第24号36页）。

(5) 〈汉藏语语言结构类型多样性诸问题〉——1975年10月24日于第八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上宣读（内容提要见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

rican Languages, No. 3, pp. 49 ~ 65)。

(6) 〈语言的农耕民型扩散和畜牧民型扩散〉——1976年7月21日于第一届日美教育文化协作讨论会上宣读(内容提要见 *Genetic Relationship, Diffusion and Typological Similariti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No. 1, pp. 1 ~ 14)。

(7) 〈类别词本质〉——1976年8月21日于SIL(国际语言学夏季讲习会)东京讲习会(东京神学大学)上演讲。

(8) 〈汉藏语中含类别词的句子的来源〉——1976年10月22日于第九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斯堪的纳维亚四国合办的亚洲研究所)上宣读(内容提要见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No. 7, pp. 66 ~ 78)。

(9) 〈亚洲大陆语言类型的推移〉——1976年10月26日于列宁格勒日丹诺夫大学演讲。

(10) 〈东亚、东南亚的语言地理类型学〉——1976年10月29日于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莫斯科)演讲。

(11) 〈东干语的地理类型学特征和东干语言学的任务〉——1976年11月5日于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部(伏龙芝[今比什凯克]市)演讲。

(12) “声调和重音”研究讲习会:〈关于汉语与东干语〉——1976年12月3日于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一般性研究计划主办的专题研究讲习会上演讲。

(13) 〈亚洲的日语——地理类型学上的推论〉——1976年11月27日于东京都立大学方言学会第148届研究会·日本言语之会上宣读(内容提要见《都立大学方言学会会报》第71号第1~8页)。

(14) 〈语言地理类型学诸问题〉——1976年12月17日于东南亚八国合办的区域语言研究中心(新加坡)宣读。

(15) 〈亚洲诸语言的地理类型学〉——1976年12月28日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讲演会(台北市)上宣读。

(16) “声调发生论”研究讲习会:〈关于汉语〉——1977年

1月29日于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一般研究计划主办的专题研究讲习会上演讲。

以上都以公开讨论或演讲的形式，征询于大洋两岸的师友同学，并承蒙给予多方面真诚中肯的意见。其中主要部分已于本书中介绍。

笔者从来不曾想把自己这样不成熟的看法汇集成书。只是由于河野六郎博士的好意，并为我创造了条件，加以弘文堂编辑部重松英树氏的热忱，才得以勉力完成。如今写完一看，更感到自己是多么仰赖于师友。

“地理类型学”这一课题，最初的启示还是在学生时代从河野博士的教诲中获得的。他说：“桥本同学，如果从语言区域的角度来考虑藏语，那可真有趣！”这一下我才彻悟。他说的是这样的事实：藏语在词汇方面和汉藏语系大有关联，然而在句法方面更像阿尔泰语；看看它的语言地域，也的确分布在汉藏语和阿尔泰语的中间。不过，为了防止误会，要特别声明，河野博士可并没有劝过我写这样的书。引述上面的话，只是表示笔者久久难忘，同时根据自己的理解作了说明，绝没有要河野博士为书中任何一个谬误负责的意思。笔者深恐素来在学术上严于律己的河野博士将为之蹙额。这里提到河野博士，明知会给他添麻烦，但无论如何必须向博士致谢。

不管启示从何而来吧，把笔者最终吸引进富饶的亚洲语言学领域的是1968年秋在新英格兰美国东部七所大学（所谓“常青藤联大”）创办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的十几位语言学界同事——其中元老包括白保罗，新手包括威廉·路易斯·巴拉德；若是没有他们同志式的鼓励和联络，我也许永远是个“性急火燎的转换生成语言学者”（a fire-eating transformationalist）。我们的学会创立以来，不到几年，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大组织。而今秋恰逢十周年，笔者谨以拙作表示深切的感谢。

然而，更应该对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的同事和有关人员表示谢意。假如没有这个独特的研究所的推动和启发，我的这种研究就根本不可能进行。同时令人难忘的是以往多年为我提供现场研